

何光平：我国需提高服务业薪酬

韩宝镇

联合早报，2012年1月17日

2011年大选是新加坡历史的分水岭，引发了政治上所谓“新常态”的可能性，如今政府即使承认难免犯错，也未必对政府不利，反而显示政府肯担当。

过去政府做对的事情，不代表可以一直重复做下去，人民的需要已经改变。我国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思想已经跟长辈不同，政府跟他们沟通需要新鲜的论点和不同的方法。

我国也需要完成上个世纪80年代未完成的改革，当时的改革并没有涉及国内服务经济，以致演变成低薪员工如今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副教授契连·乔治（Cherian George）博士兼政策研究院兼任高级研究员、战略前景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Futures）高级顾问何学渊及悦榕控股（Banyan Tree）执行主席何光平，昨天在“2012年新加坡透视论坛”上，针对“政治：一个新范式？”的课题分别发表了以上三项看法。

何光平指出，新加坡在80年代进行了重大重组，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经历了薪金改革。可是，这项改革却不完整，没有纳入国内服务经济。

他说：“我们需要完成那一项革命，在公民之间的收入关系方面，把新加坡完全带入发达社会的级别。只有解决这一点，政治上层结构才会和谐。”

根据政策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我国专业人士如医生和律师比参照样本中的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薪金略高，而较低薪员工的薪水则比发达国家的同行来得差。我国建筑工人的薪水不到医生的10%，可是其他国家建筑工人的薪水却是医生的三分之一。德国和澳大利亚建筑工人的薪水高达医生的一半。

跟香港相比，我国和香港的医生平均赚取一样的薪水。可是，我国建筑工人的薪水只是医生的9%，而香港则是25%。我国自雇水管工人的薪水（较有技术）是医生的12.5%，而香港则是30%。本地护士的薪水是医生的四分之一，而香港是33%。

这显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在职业和薪金等级的最低层，新加坡的差距最大，而随着技术提升而缩小。整体而言，新加坡医生和建筑工人或水管工人的薪水差距，比其他地方高出两倍。

对此，何光平虽然没有肯定的答案，但他推测这跟我国建筑业聘用低成本和非熟练外劳，压低了本地从事同样工作的工人的薪水有关。其他如零售和接待业的数据也类似，但差距比较没有那么大。

80年代的改革造就了生命科学、药剂业和其他高科技制造业，这些行业雇员的薪水大幅度提升。建筑、零售和接待业的低劳工成本，则使得生活和经商成本较低，而低薪的国内服务经济也促使我国的出口更有竞争力。换言之，我国出现二元收入经济，一个是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和高收入的经济，一个则是低成本、低技能的经济。

何光平认为，新加坡需要逐渐提高国内服务业的薪水，同时减少造成这类工作的低技能和低薪外劳的涌入。

另一方面，何学渊引用美国社会及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当一个人达成基本的生理需求后，会要让更复杂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而最高的需求是“自我实现”。若接受这个说法，那么当我国政府提供了食物、保安、住所、交通、保健等基本需要后，人民的期望会上升，要求更高层次的心灵需要，如社会、情感和自我实现。类似幸福指数和要求在政治话语方面有更多参与等辩论，便显示了国民需要的转变。

第三和第四代国民只看到新加坡的富裕，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不确定只是课本的摘录。能够说服他们父母和祖父母的话，在第三和第四代人的身上已不管用。因此，政府跟他们沟通需要新鲜的论点和不同的方法。

契连·乔治指出，在一个改变中的世界，政府需要更深入以及在充分信任的氛围中跟人民打成一片，以对于如何前景达成共识。

这并不是增加沟通量或者设法进入社交媒体空间的问题，而是改变沟通的语境。人们需要知道政府在其利益，以及国家面对的状况和在政策上的两难局面，跟他们是处于同一个层次的。政府即使承认自己难免犯错，也没有问题，重要地是显示政府肯担当。